

# 蔡元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

陈向科<sup>①</sup>

(1 湖南农业大学 期刊社, 长沙 410128 2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 长沙 410081)

**摘 要:** 蔡元培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, 而且也是一位翻译家。他在 20 世纪初的有关译论, 涉及译学概念等重要问题, 并提出“横译”、“纵译”与“一译”、“再译”等极有价值的观点, 见解独到, 但较少涉及有关译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。他还翻译过多部外国哲学、伦理学著作, 如《哲学要领》《妖怪学讲义》《伦理学原理》等。

**关键词:** 蔡元培; 翻译理论; 翻译实践

蔡元培被誉为“学界泰斗, 人世楷模”。作为近代中国著名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, 世人对其知之甚多。而作为翻译家, 人们对其知之甚少, 相关研究除陈福康《蔡元培的译学论述》<sup>[1]</sup>以及黄勤《蔡元培翻译观的认识论诠释》<sup>[2]</sup>之外, 似乎再无人提及。笔者经过查阅与考证, 发现蔡元培论及译学方面的文章一共有 5 篇, 分别是:《译学》《国文学讲义·序言》《译学馆校友会祝词》《译名表》《京师译学馆校友录》。这些论文皆收录在《蔡元培全集》中。此外, 他还翻译过多部外国哲学、伦理学著作, 如《哲学要领》《妖怪学讲义》《伦理学原理》等。为此, 笔者就其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。

## 一

“自甲午以后, 朝士竞言西学, 子民始涉猎译本书。”蔡元培也自此学习西学。<sup>[3]</sup>他以顽强的毅力先后学习了日、英、德、法、意等语言。1898 年, 蔡元培始习日文, 并着手翻译:“夜译《俄土战史》数页。有文从字顺之乐。”<sup>[4]</sup>刚涉足译事, 蔡元培就注意到当时翻译界任意篡改原作的现象, 并表示出反感。同年 9 月, 他阅览日本森本藤吉的《大东合邦论》时, 经与上海大同译书局中译本《大东合邦新义》比较,

发现“挖改数处”。蔡元培对此十分愤怒, 特撰读书笔记一篇, 对该中译本进行驳斥。这是蔡元培对待翻译标准问题的最初反应。

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, 蔡元培日益认识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, 开始形成对译学的见解。1900 至 1901 年间, 蔡元培在绍兴及上海搜集国内外资料, 对各级学校的课程进行研究, 撰写出《学堂教科论》一书。该书中列有“译学”这一科目。1901 年他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并开始筹划《外交报》时, 撰有一文专论译学。该文当时没有发表, 后人据其手稿, 加以《译学》之题, 收载于《蔡元培全集》第一卷中。1906 年秋, 蔡元培在北京办理赴德留学事, 兼在北京译学馆任教, 讲授国文学。在其《国文学讲义》序言中, 再度论述了他对译学独到的见解。综观蔡元培对翻译理论问题的阐述, 主要为下述几个方面。

第一, 科学地界定“译学”概念。蔡元培认为:“译学二别: 一政界之事, 一学界之事。”<sup>[5] 154</sup>所谓政界的译学: 自周时, “有夷蛮戎狄之号, 即有象寄译鞮之学, 以任象胥掌客舌人之官。”<sup>[5] 154</sup>其后历代都有政界之事, 特别是清代, “开国即有俄罗斯之约, 道咸以后, 海口通商, 交涉频繁, 立总理事务衙门董其事, 迭简出使大臣以驻于各国, 而设同文馆于京师以储译材。”<sup>[5] 154</sup>进入 20 世纪, “公法大明”, 政府应

① 收稿日期: 2008-05-12

作者简介: 陈向科, 男, 湖南华容人, 湖南农业大学期刊社编辑,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,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与编辑学研究。

懂得“苟其保自主之权,申善邻之义,国无大小,号日对等。”<sup>[5]154</sup>因此,“交涉上文野之程度,即为其国安危之所系。而我国职外交者,或通语言而昧政策,或究政策而绌语言,蛩駘相依,事多隔阂,此译学所以亟也。”<sup>[5]154</sup>由此可见,蔡元培所谓“政界之译学”,是指与外交有关的翻译工作,即将翻译与外交相结合的广义的译学。他认为,外事翻译工作者必须既通语言又明政策,融会贯通。他还强调,政界之译学事关国家安危,因此是“译学所以亟也”。所谓学界之译学,则是指学术性的翻译。

蔡元培还进一步指出,在学习西学时“吾既习惯于吾国之文,则于读书听讲之际,不知不觉常间接于国文,而后领会,此其所以为译也。”<sup>[5]390</sup>此外,即使是国文,也不管它是科学、文学,只要一作翻译,便不能一字不易,只要一作记录,也不能一字不易,尤其是我国的古文与口语也不一样,“是亦译也”。<sup>[5]390</sup>可见,蔡元培不仅对译学作了广义的理解与论述,而且充分发挥了我国自唐代以来“译即易,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”的思想。

第二,提出“横译”、“纵译”与“一译”、“再译”之说。蔡元培认为,“外国语之为译学也,以此译彼,以地者也,谓之横译。国文之为译学也,以今译古,以时者也,谓之纵译。”“由意识而为语言,一译也,此中外之所同也。由语言而为文字,再译也,此我国之所独也。”<sup>[5]391</sup>在此,蔡元培称异域语言的翻译为“横译”,古今语言的翻译为“纵译”,并认为由意识而发为语言,也是一种翻译。这一思想充满哲理,发前人所未发。而他称为中国独有的“再译”与其“纵译”的说法相近,是指当时我国言文不统一。这一观点,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重要依据。

第三,指出我国外语教育和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。“全国士流,能读和文书者,尚百不得一,能读西文书者,且千不得一,我国译学犹稚焉。”“我国学者,类习英文,近则日文渐盛。其余国语。精者鲜矣。”<sup>[5]155</sup>一个“稚”字,点出了当时中国翻译界的现状。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,蔡元培又根据国家当时的实力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:“政界之事,既与各国交通,非分习各国语不可。”<sup>[5]155</sup>“学界之事,则在习日文的同时按需要兼习其它语言。而‘府县诸学,姑以英、日为界,亦因地而制宜者也。’”<sup>[5]155</sup>

综上所述,蔡元培在20世纪初的有关译论,涉

及了译学概念等问题,并提出了“横译”、“纵译”等极有价值的观点,其见解无疑是十分独到的。但也应该看到,蔡元培的翻译理论还较多地限于对概念的发挥,以及针对当时翻译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见解,而较少涉及到有关译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。这是其翻译理论的不足。

## 二

蔡元培不仅对翻译理论有独到的见解,而且身体力行,翻译出版了多部外国哲学、伦理学专著。

1902年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,主持西方文化典籍的编辑翻译工作。1903年蔡元培把德国科培尔《哲学要领》的日译本译成中文,交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此书分为“哲学之总念”、“哲学之类别”、“哲学之方法”、“哲学之系统”4章,“皆以最近哲学大家康德、黑格尔、哈尔妥门诸家之言为基本,非特唯物、惟心两派之折衷而已。”<sup>[5]176</sup>这是蔡元培从事翻译的处女作,堪称当时中国哲学教科书的先驱。

《妖怪学讲义》是蔡元培翻译哲学著作的又一力作。该书是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的一部破除封建迷信的重要专著。在蔡译本之前,已有何琪的《妖怪百谈》徐渭臣的《哲学妖怪百谈》等几种译本,但蔡译本流传最广。蔡元培译此书,最初以《妖怪学讲义》为题,刊载在黄摩西主办的《雁来红丛报》1906年的第1至第7期上。以后由亚泉学馆购印。但译稿遭火灾,5册中仅余“总论”1册。后由商务印书馆于同年8月印行。该书在中国近代西方哲学传播方面起了重大作用。张东荪认为,中国输入西洋哲学可分为三个时代,“第一个时代是用蔡元培先生所翻译的井上圆了《妖怪学》为代表。”<sup>[5]628</sup>这《妖怪学》“代表日本人初期接受西洋哲学的态度与反应,而蔡先生把它翻译到中国来,却亦是代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哲学的态度。这是西方哲学初到东方来的应有的现象。”<sup>[5]628</sup>

蔡元培还于1909年翻译了德国鲍尔生所著的《伦理学原理》。此书以日本蟹江义丸的日译本为蓝本,参考原著译成,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《伦理学原理》中的伦理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,在哲学上代表了康德的心物二元论。蔡元培译此书时,正

是中国处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,要求中国对西方文化深入了解的时候。因此,该书出版后,对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,还被国内一些学校采用为伦理学教科书。据湖南第一师范《校志》记载,杨昌济在该校教伦理学时,就把此书译本作为修身课教材。当时正在该校求学的毛泽东极爱此书,在这本约 10 万字的译著中作了 12000 字左右的批注。多年后,毛泽东仍高度评价:“它(指《伦理学原理》)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,分析所接触的问题,得到了启发和帮助。”<sup>[6]</sup>蔡元培译著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。《伦理学原理》先后 8 次重版,1940 年商务印书馆又再度重版,编入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”。

在从事具体的翻译著述时,蔡元培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的。1903 年译《哲学要领》时,他因“苏报案”避走青岛。“其时无参考书,又心绪不甚宁,所译人名多诘屈。而一时笔误,竟以空间为宙,时间为宇”。所以,蔡元培时刻耿耿于怀,“常欲于再版时修正之。”<sup>[7]</sup>

蔡元培还力图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译名统一问题。首先,尽量避免使用新译语。“本书译语,务取最习用者。习用者不可得,始立新语。为译语志要,附于书后,以备检核。”<sup>[8]</sup>其次,创立《译名表》。该表是蔡元培于 1916 年秋在法国与李煜瀛合作完成的,分功用与方法两部分。“功用”部分简要分析了新旧译名法的利弊,指出“向用之译名法”的弊病主要是:不能划一名词,人人而殊,时时而殊;不能使读者由中文推求西文之原字。而新译名法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译名统一的问题,而且使读者能推求西文

之原字。“方法”部分则介绍了译名表的使用方法。

蔡元培敏锐地洞察到当时中国翻译界存在的问题,并就译学理论问题作了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独到论述。在全面学习西方文化,追求西方文明底蕴的同时,将西学中的哲学、伦理学及美学理论等学术思想作为重点内容予以特别考察和研究。他的翻译实践为此目的服务,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他不失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陈福康. 蔡元培的译学论述[J]. 中国翻译, 1997(1).
- [2] 黄勤. 蔡元培翻译观的认识论诠释[J]. 安徽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06(1).
- [3]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. 蔡元培全集: 第 3 卷[M]. 杭州: 浙江教育出版社, 1998: 659.
- [4] 王世儒. 蔡元培先生年谱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8: 33.
- [5] 高平叔. 蔡元培全集: 第 1 卷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4.
- [6]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. 毛泽东早期文稿[M]. 长沙: 湖南出版社, 1990: 276.
- [7] 蔡元培.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[M].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1998: 7.
- [8] 高平叔. 蔡元培全集: 第 2 卷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4: 345.

(责任编辑: 文爱军)